

解密“怪老头”郭春年(下)

“怪老头”心里那杆“秤”，称的是啥？



核心提示

□记者 邓超 通讯员 王利强 / 文 记者 张晓理 杜武 / 图

在战场上英勇负伤的郭春年，脱下戎装和英雄的荣光，回到家乡成了普通的农民。他澄清了自己成为“烈士”的误会，也开始了平静淡泊、波澜不惊的后半生。后半生，他还是英雄。



儿媳陪郭春年在院子里聊天。

“一根筋”的“怪老头”，他为什么这么“憨”？

郭春年当生产队长时，带领乡亲们发展生产、大搞建设。他一心带着大伙儿种庄稼、搞养殖，还受到过县里的表彰。

20世纪70年代，他的事迹被记者写成一篇文章——《身残心红的好队长》，还入选过河北省小学教材。

长期窘迫的生活状况一直考验着郭春年。然而面对选择，他总把自己放到最小，直至忽略不计。

有一年，县里有位副县长来村里作调查。副县长说：“春年，你是伤残军人，有啥困难尽管跟县里说。”郭春年忙摆手答：“没困难，没困难，我家够吃够穿够住，不给国家添麻烦。”

人多缺少少穿，郭家咋会没困难！

1967年，郭春年卖了一头猪、一头驴，外带一个石磨，再加上所有积蓄，才盖起两间瓦房。全家六七口人挤在这两间房里，一直住了30年。

郭春年对家人都很严厉，但当柴冬菊晚年因为严重的风湿卧床不起时，他蹒跚着脚步，为媳妇做饭、端尿，一干就是8年，直到媳妇去世。在他心里，柴冬菊跟他这半辈子受的委屈，他几辈子也还不清。

很多年来，包括子女在内的所有人都认为，郭春年放弃留在城里提干的机会而回到农村，已

经够“傻”了。没想到，后来，他又做了更“傻”的事儿。

20世纪80年代，国家出台政策，对一等伤残军人，允许家属户口农转非，政府还可以为其家属在城镇安排工作。可是，郭春年只为柴冬菊申请了户口农转非，并拒绝为两个儿子申请工作。

1985年，18岁的三儿子郭社立参加高考，离大专分数线就差两分。按照当时的国家政策，伤残军人、立功军人的子女高考可以加5分。当时，郭社立满心期待着，父亲能拿着证明找有关部门，自己就能顺理成章地上大学了。谁知，任凭柴冬菊如何苦求，郭春年就是不肯：“他自己能考上就去上，考不上拉倒。”

还有村里那么多推荐出外工作的机会，郭春年一回都没有给过自己的孩子。有一次争吵时，柴冬菊终于忍不住骂郭春年：“你就是个憨子，自己孩子你咋一点儿都不管！”柴冬菊心里真急啊，自己5个孩子，除了小女儿当了教师外，4个儿子一直没有固定工作，不是在家务农，就是在外打零工。

其实，郭春年心里那杆“秤”他自己明白：“这么多年，国家一直给我发抚恤金，我给国家添的麻烦够多了，得到的东西已经不少了，跟比我们还困难的乡亲争什么？”

评论

坚定信念 真学实干

□洛译

无言老兵郭春年的故事，正在河洛大地传诵。

英雄的故事，磁石般吸引我们不断追寻；英雄的精神，鸣鼓般唤起我们干事创业的斗志、担当作为的激情。

——学习郭春年，叩问心扉 树立导向。

活着是为了什么？实现人生价值靠什么？不同的回答，决定着不同的人生道路、生活方式。英雄郭春年，不愿在休养院享供养，不选进县政府当干部，他用行动为自己的价值坐标定下焦点：怀抱崇高理想、充满奋斗激情的人生，才是有价值的人生。

只有身不为物役，才能活得精彩；只有心不为名累，才能走得坚定。

——学习郭春年，敢于担当 绝不退缩。

战争年代是荣立军功的好战士，返乡务农是不怕得罪人、不怕环境变的生产队长——面对困难，郭春年始终保持着攻坚克难、敢挑重担的勇气。任务压身时，不畏缩止步，而是迎着困难上去，拼出一番作为。

干事创业，要的就是这股劲儿！有了这股劲儿，才能期待峻岭之上的美景，才能成就无愧于人生和时代的伟业。

——学习郭春年，踏实去做 不计得失。

干工作，郭春年是“一根筋”：凌晨出门摸黑回家，想的就是一件事——把建设搞好，把牛羊喂壮。无论身份怎样改变，他咬定目标不放松的坚持不变。他不计个人得失，干一行就爱一行，守一份职就尽一份责。

舍弃期待收获的浮躁，只存艰苦踏实的付出，自然不慵、不疲，自然不惑、不怨。

——学习郭春年，心存大局 永葆本色。

面对利益，郭春年有些“憨”：干了30年生产队长，不要村里一分钱补助；生活艰难，宁让家人“记仇”，不向组织伸手。习惯了过苦日子，他只记得“比我还困难的乡亲”。60年如一日，顾全大局，一心为民，从不懈怠，郭春年保持了一名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，践行了在炮火声中入党时的铮铮誓言。

自重、自警、自励，立身不忘做人之本，坚守心中磊落明净，必当为世人所推崇、铭记。

1 我要回家，不给国家添麻烦！

从朝鲜到东北，重伤员郭春年辗转数家医院，每次动手术都在和死神搏斗。1954年，伤情渐趋稳定的郭春年被送到了位于郑州的河南省荣军军人休养院。

休养院评定他为一等一级伤残：由于下颌和下牙被弹片打碎，医生把纱布卷成长条塞到他嘴里，也止不住不断往下流的口水；手术植入的一段人造气管让他整日咳嗽；他的小腹两侧被挖去两块烂肉，留下两个碗口大的洞……

为国家牺牲这么大，是该好好享受的时候了。可是，尽管饮食起居有人照顾，还有许多曾在战场负

伤的战友作伴，郭春年却一天天地孤独、消沉下去了。

为什么？医生们以为，这是一个正常人重度伤残后应该有的适应期。但郭春年的答案让大家吃了一惊，他说：“我要回老家！”

“春年，你都成这样了，回去能干啥？”许多人不解地问。

“我回去可以种地养活自己。我还年轻，不想给国家添麻烦！”这时的郭春年，才19岁。

郭春年吵着要回家的时候，正逢国家出台伤残军人可自愿选择分散供养的规定。当时休

养院所有限，对愿意回地方分散供养的伤残军人，国家发放抚恤金。

1956年，郭春年成了休养院里第一个报名回乡的人。收拾行李离开那天，他发觉自己还是舍不得，不是舍不得衣食无忧的生活，而是“一想到往后不能常见这些老战友了，心里就难受”。

此后的几十年，郭春年曾多次从老家伊川出发，坐长途车去省城拜访一直住在休养院的战友。“这么多年了，他们都分了房子、成了家，在城里过得挺不错，我看着就像自己的生活一样美呢。”

2 回乡的“烈士”，做了30年分文不取的“义务工”

郭春年回来了！这一消息当时在白沙村引起了轰动。

“春年不是在战场上牺牲了吗？！”大家的诧异不仅因为郭春年大变的面相，还因为一场阴差阳错的“误会”。

郭春年当时在战场上被兄弟部队发现后转去后方医院，与自己团部失去了联系。团部里有几个郭春年的同乡叫李铁梁，也是伊川白沙人。战斗结束后，李铁梁急着打听老乡的下落。

“前线阵亡的战士里找不到，活着的人里也找不到，我们都以为春年牺牲了。”今年80岁的李铁梁对当时的情况记忆犹新，“后来，598团团部给白沙乡政府寄去一个黄挎包，里面有一封郭春年的烈

士证明，还有两双袜子、一个钢化杯，算是烈士抚恤(物品)了。”

直到郭春年活生生地站在乡亲们面前，这个“误会”才消除。

回到县里时，组织部门认为郭春年是战斗英雄又是党员，想按政策安排他留在县政府当干部。可他说：“还是让我回去吧，比我优秀的人还很多……”

人生重新开始了。

1956年，21岁的郭春年当上了村里的生产队长。他投入满腔热情，带着乡亲们搞建设。

“我一不要村里补助，二不怕得罪人。”“新官上任”的郭春年第一次召集队员们开大会，就拍着胸脯说。话一说出，台下就议论开了：“不拿工资白干活，春年这小子脑

袋被炮弹震坏了吧？”

别看生产队长官儿不大，干的却是没日没夜的活儿。早晨5点多出门，摸黑才能回家，日子久了，郭春年的媳妇柴冬菊怨气就来了。“你成天不着家，里外都得我操心，我也要上工，孩子没人带，这日子咋过？”好几次晚上熄灯后，柴冬菊在被子里对他哭诉。

郭春年从来不争辩，他深知媳妇的难。当时，他每月30多元的抚恤金，根本不够一大家子人食用。有一回，郭春年一家五口人两斤玉米掺喝了一整天。

这么艰难的日子，郭春年硬是没找家张口要过东西。就连有人想托郭春年“走后门”送来的几根油条，他都固执地退了回去。